

# 废墟上筑起战斗堡垒

## ——第14集团军某炮兵团军地联建基层党组织开展鲁甸抗震救灾纪实(上)

本报记者 李争平 通讯员 向辉

### 时代先锋



炮兵团“党员突击队”向偏远地区运送救灾物资。

8月3日16时30分，云南昭通乌蒙山区发生大地震，震中鲁甸！陆军第14集团军炮兵某团闻令出动，昼夜兼程，率先抵达鲁甸县火德红镇、巧家县包谷垭乡两个重灾区。这支被誉为“乌蒙铁军”的部队有着丰富的抢险救灾经验，到达灾区后，立即与熟悉灾区地理民情的地方党组织开展了联建共创活动，在抗震救灾火线上筑起一座座攻坚克难的战斗堡垒，推动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 军地基层党组织融为一体，救灾力量拧成一股绳

8月4日凌晨2点，在昆明出差的火德红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小虎，冒着暴雨一路“摸爬滚打”赶回镇里。和镇党委书记臧尔方一碰头，眼前的情况让他“傻了眼”：此时，全镇6个村(社)54人遇难，13人失踪，197人受伤；房屋倒塌14000多间、严重受损10000多间……从未碰到过的重灾，撕扯着镇党委一班人的心。

凌晨4点，贴着“乌蒙铁军”标志的第14集团军炮兵某团救灾车队驶入镇里。摊开地图、介绍灾情、明确任务……不到10分钟，朱江政委作出部署：兵分三路，由镇村领导引路，深入受灾最严重的李家山、王家坡和南箐村(社)抢救生命。

雨越下越大，前往李家山的路已被山体塌方阻断。副团长樊治云正要前去探路，同行的镇党委副书记保德富和64岁的老党员李天富向他建议，“这里过不去，咱得绕路。”他们带着队伍在崇山峻岭间穿行，终于把部队带进了大山深处的李家山村。

巧家县方向，团长陈勇带着一营官兵一到包谷垭乡，通过党委书记方永远了解到：新坪村受灾严重，大量伤员没有转移出来。二话不说，陈团长带领官兵火速前往。刚到村口，有群众报告：

一名年近80的老大爷被砸伤，困在山上。陈团长带领12名党员骨干翻山越岭，将老大爷和另外两名重伤员抬到医疗救治点……

深夜，军地领导聚集在抗震救灾指挥帐篷里。“抗震救灾，关键靠党！关键时刻，军地基层党组织必须融为一体，实行统一领导，把军地救灾力量拧成一股绳，实现救灾效益最大化！”炮兵团和镇、乡领导在这个不眠之夜达成了军地联建基层党组织开展抗震救灾的共识。

联建活动很快得到军地上级领导批准：炮兵团5名常委分别担任受灾最严重的5个行政村党总支副书记、28名营党委委员担任自然村党支部副书记，207名党员编入151个村民党小组。联席会议、形势分析、帮难解困、责任追究等制度也随即建立。

### “官兵们连续30多个小时没休息，真是‘铁军’啊！”

第一次联席会议，在8月5日凌晨召开：抢救生命、打通道路、转移群众是救灾工作重中之重。

目光，聚焦在牛栏江堰塞湖上。地震造成山体垮塌，致使牛栏江红

石岩水电站段形成巨大的堰塞湖，水位不断上涨，严重威胁江边数百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被困在红石岩珍珠温泉景区的游客也生死未卜……

堰塞湖暗流涌动，湖面漂浮物横冲直撞；两边山体像刀砍斧劈一般，不时有滚石滑落。朱江和胡小兵带领16名党员骨干搭乘2艘冲锋舟，沿江搜救。

整整一天，他们转移被困群众16名，打捞3具遇难者遗体。

堰塞湖对岸的红石岩村，还有一些群众困在山中。团长陈勇面对地图，拿着指南针，对村党总支书记蒋先林说：“请你把被困群众的居住地和途经路线在地图上标绘出来。”随即，陈团长和蒋书记一声号召，30名官兵与12名精壮村民编成几个小组，翻过3座大山，闯过6处塌方区域，将被困群众转移出来。

8月4日22点，在火德红镇执行搜救任务的6连连长郭小良接到副镇长李文才电话：166吨救灾物资运抵镇上，急需紧急卸载。不到5分钟，郭连长带领67名官兵火速赶到。奋战8小时，直到次日凌晨6点，13车物资全部卸载完毕。官兵回到宿营地，还没端起饭碗，李副镇长的电话又来了：“又有一批救灾物资到了……”

的正面意义。

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桂雄说，对香港实行普选是非常正确的决定，普选一定要围绕中国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保证“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繁荣稳定。

印尼资深政治分析人士李卓辉认为，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人无权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实行普选的决定，这是民主进程中的重大进步，是政治改革的里程碑。

埃及前驻华大使、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阿卜杜勒·瓦哈卜·萨基特说，每个国家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国情，因而需要选择一条符合自身发展国情的道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选举办法最大限度凝聚了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

“先干活，再吃饭！”郭连长大吼一声，官兵再次出征。

据统计，“黄金72小时”内，军民携手共抢救救重伤员150余名，转移安置群众3400多人，抢救救灾物资1000余吨。

### 在灾后重建中，基层党组织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黄金72小时”生命大救援刚刚结束，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来了新的命令：军地合力组建“红旗社区”，确保受灾群众过渡安置生活稳定。

“要建，就建一个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标准化社区，让受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的温暖。”

社区选址任务，落在朱江政委和臧尔方书记肩上。灾区山高坡陡，“不能让群众住得提心吊胆；不能让群众住着不方便……”8月9日，两人翻山越岭，实地考察，最终把地址选在银厂村和镇上的接合部。

镇领导动员土地承包户收割庄稼、征集大型机械平整场地；炮兵团拨出专款购置土木工具，官兵们搬运水泥、沙石硬化地基，搭建帐篷……短短两天，占地2400平方米的第一座“红旗社区”拔地而起，163名受灾群众喜迁新居。6天后，一对新人在“红旗社区”举办了婚礼。不到半个月，8座“红旗社区”建了起来，集中安置受灾群众3000多人。

抢险救灾度过了危急时刻，灾后重建工作有序开展。8月17日，“乌蒙铁军”奉命回撤。

这些天，火德红镇党委书记臧尔方依然每天与回到驻地的炮兵团政委、李家山村党总支副书记朱江通电话，念叨灾后重建的大事小情。几个好主意就在与“朱副书记”的念叨中生发出来：牛栏江红石岩堰塞湖后期开发，可参照唐家山堰塞湖模式，打造成遗址性景观；协调帮助有条件的村民外出打工，组织妇女们绣十字绣，联系商家购买；组织老人、小孩收集废旧物资，政府统一收购……

臧尔方感慨地说：“灾后重建的任务十分繁重，党员干部不能丝毫懈怠，基层党组织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 专家解读

#### 《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背景下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从广义上讲，党的治理水平体现为对于国家和各种社会关系或秩序的调节水平。党依法执政，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调节是现代治理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方式之一。如果用学术化语言表达可以把治理称作“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过程”，也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政治体系的领导力量，党内政治生活状态对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决定了党自身的制度化水平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在基础。因此，提升全党制度化水平，是提高党的治理能力的重要一环。在党内制度与国家法律关系上，《实施方案》一方面坚持党内制度与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对发展共产党员的要求、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等方面提出高于普通公民的要求，显现出党在提高治理能力、依法治国条件下的自觉意识。

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构成部分，又是担负起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职责的政治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国防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是全方位的改革，理所当然包含有党的建设。但是，党的建设并非简单地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引领或改造环境。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领导”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如制定政策的规则，实施政策所需的组织和人才保障，都需要有特定的制度环境予以保护。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就是构成有利于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党内制度环境。

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也是党自身发展、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大思路。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并非单指某一方面的制度建设，而是指以制度改革推动党建整体往前走，以各种制度要素的整合、创新，形成求真务实、勤政廉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这一思路，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成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制定了以党章为核心的系列党规党制，保证了党组织的正常运行和党的事业的顺利发展。但怎样推动党的整体发展，不同时期各有侧重。1980年邓小平提出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基于改革开放前以政治运动模式推动党建的教训而提出的探索之路，随后党中央把改革和制度建设确定为推动党的建设的新的路子。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探索，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新经验新成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因此，提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就是提炼、升华有效管用的新成果，解决出现的新问题，以制度改革带动党建全局，保证党组织整体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实施方案》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党的建设方方面面，从发展党员、干部选拔任用，到思想教育，再到党内监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都需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核心制度进行协调、贯通，体现共同的而非矛盾的价值取向和制度效应。这种综合性把握就属于顶层设计。《实施方案》本身就是内容、方向、时间进度上顶层统筹安排的结果。但所有的制度都来源于实践的需要，有的制度就直接来源于基层创新成果，如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就是基层在实践中提出，中央予以升华并以制度形式确立为全党基层党建的共同目标。没有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结合，就没有制度改革的实际进步。

二是长期性、阶段性和回应热点问题相结合。有些制度是党内长期坚持的基本制度，如民主集中制。但民主集中制如何具体实施，怎样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怎样有序实现党内选举，就与时代赋予的条件以及运行规则的科学化相关。按照《实施方案》的统筹安排，建立地方党委民主决策机制，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就是可以预期的重大事项，将成为党的建设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民主集中制下的规范性和引导性制度。这就是长期性与阶段性的结合。对于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如整治裸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领导干部在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兼职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具体制度规定，还会进一步出台相应规定，构成严密体系，防止出现有悖于党的性质和宗旨的行为。

三是继承与改革相结合。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在继承优良传统基础上的改革。比如，党的群众路线是传统优势，但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果仅靠领导干部的自觉性去联系群众，就难以满足社会的要求。由此，建立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就成为继承与改革创新相结合点之一。类似继承与创新蕴含在多种具体制度之中。

四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既牵涉到宏观性制度，也牵涉到具体的微观制度。宏观性制度，如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其党内“立法”层次仅次于党章，对党内政治生活乃至党和国家政治生态都有重大影响。1980年出台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对调整党内关系、健全党的政治生活具有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但毕竟过去30多年了，改革开放的形势、党内生活现状都有变化，修改准则也是必然之势。微观层面的制度修订，如基层党建，又细化为农村、国企、社区、社会组织、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多领域多行业的基层党建制度规定。宏观与微观结合，才能保证党内生活正常运转。

五是制度规范与教育引导相结合。所有的制度都体现了特定的价值取向，换言之，党的宗旨、目标等都反映在各种制度规定中。如民主集中制中，既反映在实体性制度中，也反映在程序性制度中；再如，对干部的考核评价，用人导向等等，都体现了特定价值追求。制度的科学性强制性教育引导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制度应有的功能。教育来自多方面，既有干部培训教育制度，也包含有其他形式的甚至是潜移默化式的教育引导。唯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有对制度本身的认同基础。

当然，制定制度仅仅是迈出不可缺少的一步，执行制度更是艰巨过程。一般说来，任何政策和制度，如果执行范围越广泛、牵涉到的人越多，客观上就越易于产生边际效应递减现象。因此，需要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职能，相互配合，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否则制度就形同虚设；坚持“八项规定”以来的新传统，中央自上而下带头做起，就易于得到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拥护，有利于制度的贯彻落实。虽然这些并非执行制度的全部条件，但至少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 海外人士支持香港政制向前发展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决定，明确行政长官普选的原则和制度框架。海外专家学者和侨界人士积极评价和支持香港政制发展，认为这一重大法律决定符合香港实际，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是一个明智之举。

美国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吴惠秋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的决定对于香港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决定中关于特区政府行政长官的提名办法、参选人人数和任命等内容切合香港实际情况，照顾到香港人民的意愿，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给予了香港很大的自主权。

美国休斯敦大学国际关系及东亚政治系副教授李建强说，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都不是一步到位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方案是香港民主政治进程迈出的重要一步。大芝加哥地区华侨华人联合会主席、芝加哥城市学院——杜鲁门学院(芝加哥)生物学系教授汪兴无说，中央政府信守承诺，2017年在香港实行普选，普选应该有章法。

泰国《亚洲日报》副社长钱丰说，香港问题是国际内政，外国政府不应干预。香港回归前一直作为英国殖民地，由英国派来的总督管理经济政治一切事务，这是彻底的独裁统治。直至1997年回归后，香港才开始民主进程，从中央政府提名特首，到2017年实现普选，可以说香港民主将实现大跨越，香港民众及国际社会都应看到这件事

的正面意义。

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桂雄说，对香港实行普选是非常正确的决定，普选一定要围绕中国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保证“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繁荣稳定。

印尼资深政治分析人士李卓辉认为，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人无权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实行普选的决定，这是民主进程中的重大进步，是政治改革的里程碑。

埃及前驻华大使、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阿卜杜勒·瓦哈卜·萨基特说，每个国家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国情，因而需要选择一条符合自身发展国情的道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选举办法最大限度凝聚了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

的正面意义。

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桂雄说，对香港实行普选是非常正确的决定，普选一定要围绕中国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保证“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繁荣稳定。

印尼资深政治分析人士李卓辉认为，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人无权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实行普选的决定，这是民主进程中的重大进步，是政治改革的里程碑。

埃及前驻华大使、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阿卜杜勒·瓦哈卜·萨基特说，每个国家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国情，因而需要选择一条符合自身发展国情的道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选举办法最大限度凝聚了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

有利于香港经济的繁荣发展，有助于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社会和谐。

东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韩军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规范了香港的选举基本方针，整个选举有章可循，符合香港基本法。中国人的事情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一些国家别有用心，说三道四，海外华侨华人理应坚决反对和抵制。

东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主席郭文昌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正确落实了香港基本法，符合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符合广大香港同胞的根本利益。这一决定来之不易，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参与记者：周而捷、张永兴、周檬、常天童、马岩、丁小溪、徐静、邵莉)

的正面意义。

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桂雄说，对香港实行普选是非常正确的决定，普选一定要围绕中国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保证“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繁荣稳定。

印尼资深政治分析人士李卓辉认为，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人无权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实行普选的决定，这是民主进程中的重大进步，是政治改革的里程碑。

埃及前驻华大使、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阿卜杜勒·瓦哈卜·萨基特说，每个国家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国情，因而需要选择一条符合自身发展国情的道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选举办法最大限度凝聚了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

有利于香港经济的繁荣发展，有助于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社会和谐。

东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韩军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规范了香港的选举基本方针，整个选举有章可循，符合香港基本法。中国人的事情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一些国家别有用心，说三道四，海外华侨华人理应坚决反对和抵制。

东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主席郭文昌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正确落实了香港基本法，符合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符合广大香港同胞的根本利益。这一决定来之不易，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参与记者：周而捷、张永兴、周檬、常天童、马岩、丁小溪、徐静、邵莉)

的正面意义。

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桂雄说，对香港实行普选是非常正确的决定，普选一定要围绕中国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保证“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繁荣稳定。

印尼资深政治分析人士李卓辉认为，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人无权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实行普选的决定，这是民主进程中的重大进步，是政治改革的里程碑。

埃及前驻华大使、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阿卜杜勒·瓦哈卜·萨基特说，每个国家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国情，因而需要选择一条符合自身发展国情的道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选举办法最大限度凝聚了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

## 香港政制发展属中国内部事务 香港民主发展的历史性进步

香港9月4日电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办公室4日表示，按基本法推动政制发展属中国内部事务，应由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决定。行政长官办公室4日发表声明回应传媒查询前港督彭定康言论，声明指出回归前历任港督均不是由市民选出，而《中英联合声明》完全没有提及普选。

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决定，明确了从2017年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这一决定反映了香港主流民意，开启了行政长官普选的大门，对香港民主发展、对“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具有历史意义和重要影响，为香港的民主发展历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正如决定指出的，“实行行政长官普选，是香港民主发展的历史性进步”。

香港回归前，没有民主制可言。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港督由英国政府委派，港英当局的行政局和立法局议员也在很长一段时期由港督委任，港人没有民主的权利。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府决定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时，就制定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承诺循序渐进发展香港政制。1997年香港回归后，港人第一次有了

选举行政长官的权利。第一任行政长官由400名港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第二任行政长官选举时，选举委员会扩展到800人。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时，选举委员会又扩大到更具广泛代表性的1200人。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宣布在2017年香港可以普选行政长官。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为香港普选行政长官正式打开了大门。香港回归17年来的民主发展进程，速度已相当于西方过去的100多年。

关于如何实现行政长官普选，早起草香港基本法开始，香港社会就开始争论，直到现在，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然难以达成共识。要落实行政长官普选，必须对一些具有很大的争议的核心问题予以明确，特别是纠正明显偏离基本法的错误认识，否则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不可能实现。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行使中央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的决定权的重大举措，是在香港民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上做

出的果断抉择，决定指明了制定行政长官普选办法的方向，为香港落实行政长官普选奠定了法律基础。

目前，香港民主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如何落实行政长官普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应当看到，落实行政长官普选，将使500多万香港合资格选民第一次实现一人一票直接选举行政长官的权利，同时也是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全部议员实现普选创造条件。香港居民一向务实，香港近几十年来经济社会取得较大发展，原因有多种，其中一条就是香港居民的理性和务实精神。这种精神对解决目前普选面临的问题尤为关键。理性就是从香港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求同存异，为实现普选创造条件；务实就是顺应绝大多数市民希望现实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愿望。相信有爱国爱港的广大香港居民的支持，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实现行政长官普选的目标。